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
程

第十七輯 第四冊

南唐詩史(上)

孫華娟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七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4 冊

南唐詩史（上）

孫華娟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南唐詩史（上）／孫華娟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17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七輯；第 4 冊）

ISBN 978-986-404-072-8（精裝）

1.詩歌 2.詩評

820.91

103027249

ISBN-978-986-404-072-8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七輯 第 四 冊

ISBN：978-986-404-072-8

南唐詩史（上）

作 者 孫華娟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七輯 14 冊（精裝）台幣 22,000 元 ·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南唐詩史(上)

孫華娟 著

作者簡介

孫華娟，女，1977年出生於湖北建始縣，200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200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就職於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主要研究中國古代詩學。發表過《隋唐曲〈楊柳枝〉源流的再探索》、《古典主義的階段性演進——王國維的古雅說、天才論及文體觀》等論文，出版有《心香寄遠——書信選注》、《中國古代詩歌研究論辯》等著作。

提 要

南唐詩是由唐詩向宋詩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本文從歷時的角度考察了南唐詩前後的發展演變過程，同時將南唐文化作為其詩歌的整體背景來觀照，此外，也探討了南唐詩和南唐文化在宋初的影響。

第一章考察了楊吳時期以及南唐先主李昇時代的詩壇及其文化背景。李昇任昇州刺史期間開始的延攬文士、彙聚圖籍，以及在南唐國建立後設立廬山國學等措施，對於金陵和廬山兩個詩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金陵詩壇在此時奠定初基，李建勳成為南唐早期詩人的代表，同時以成彥雄為代表的新一批詩人開始嶄露頭角。作為本章相關內容的延伸，附錄了《唐末及五代初期九華地區詩人群體考察》及《隋唐曲〈楊柳枝〉源流的再探討》兩文，放在全書之末。

第二章考察的是中主李璟時代的詩歌及其文化背景。由於李璟的文治政策，南唐的文化特質在此期初步形成，此時也是南唐詩最為繁榮的時期。金陵詩壇走向壯大與成熟，不僅詩壇的成員增加，詩歌的表現內容也擴大了，黨爭、貶謫、戰亂等內容進入了南唐詩人的筆下，徐鉉也在此時達到其創作的高峰。廬山詩壇在此時也十分興盛，其成員主要是僧道、處士和士子三類人，他們彼此之間的交往酬唱構成了廬山詩壇的重要活動內容，李中是廬山詩壇中成就較高的詩人，他從廬山國學到踏上仕途的經歷代表了廬山國學士子普遍期望的道路。

第三章主要考察後主李煜時代的南唐文化及詩歌。李煜即位以後，有一個較重視儒學的時期，並且他本人便有儒學方面立言明道的著述，這引起了南唐文士普遍的著述之風以及博學的好尚。另一方面，南唐此時普遍的清貴趣味，成為南唐文化特質的一部分。但是，此時無論金陵詩壇還是廬山詩壇都在逐漸走向沉寂，只有李煜本人以及李中、孟賓於、潘祐、劉洞等人還有較多詩作，但李中、孟賓於皆流落於地方，金陵的失陷，使得南唐詩壇宣告終結。

入宋以後，南唐詩歌的影響仍舊不可低估，這正是本文第四章重點考察的內容。由於五代時北方的文化長期落後於南方，以至於宋初基本統一以後，南方文化尤其是南唐文化成為宋初可以汲取的重要資源。宋廷對南唐文化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以軍事勝利相驕，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對南唐文化的歆羨。詩歌同樣是南唐留給宋代的重要文化成果，南唐詩在宋初詩壇的地位，不僅指南唐入宋的徐鉉、鄭文寶等人以創作實績居於宋初三十年中影響最大的詩人之列，而且他們先後對白居易、李商隱、杜甫等詩學典範的關注和師法也輻射到當時的詩壇，王禹偁、楊億等人對當時詩風的扭轉都有得自他們的影響。另外，南唐文學、文化也以家族傳承的方式繼續對宋代的文學、文化產生影響。

本文通過詩史的鈎沈，部分恢復了作為五代十國時期詩歌重鎮的南唐詩壇的原貌，並對南唐重要詩人李建勳、李中、徐鉉、鄭文寶等人的詩歌進行了新的全面觀照，南唐詩對宋初詩壇的影響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通過分析楊億等人對當時詩壇的認識，以及還原宋初原南唐詩人的創作實績和詩學觀、詩學典範，本文最後認為：原南唐詩人不僅在宋初三十年的詩壇舉足輕重，並且對宋初詩風由白體向西崑體的轉變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目

次

上 冊

緒論：研究對象及研究現狀	1
第一章 李昇時代楊吳及南唐的詩歌與文化	13
第一節 李昇與金陵、廬山兩個詩壇的形成	13
一、延士與賦詩	16
二、圖籍的彙聚及其對詩壇的影響	20
三、廬山國學的設立及其對後期廬山詩壇的影響	24
第二節 金陵詩壇的初建及其重要詩人	29
一、金陵詩壇的形成與發展	30
二、早期金陵詩壇的代表詩人李建勳	48
三、金陵新詩風的代表成彥雄及其《柳枝辭》	59
第二章 中主時期南唐詩歌及其文化背景	71
第一節 李璟時代南唐文化概況	72
一、李璟時代南唐的文治及其影響	73
二、南唐文化特質的初步形成	79
第二節 金陵詩壇的壯大與成熟	92
一、金陵詩壇的壯大	92
二、新詩風的成熟	109
第三節 徐鉉在中主時期的詩歌創作及理論	123
一、中主時期徐鉉的詩歌	124
二、徐鉉的詩學觀及其背景	142
第四節 廬山詩壇	148
一、廬山詩壇的構成	149
二、李中：從廬山國學到踏上仕途與遭遇戰亂	163

下 冊

第三章 後主時代的文化與詩歌	173
第一節 李煜時代南唐文化特質	174
一、奉佛與習儒	174
二、著述之風與好尚博學	178

三、清貴藝術趣味的形成	183
第二節 「可憐清味屬儂家」——南唐王室李氏家族文藝傳統的回顧及評價	191
一、南唐宗室的文藝傳統	191
二、後主李煜的詩文	201
第三節 後主時代的詩壇	214
一、金陵的詩僧	215
二、金陵的新老詩人	218
第四章 宋初南唐文化與詩歌的餘波	231
第一節 宋初文化格局中的南唐形象	232
一、五代宋初北方的文化狀況及宋初人對南唐文化的矛盾態度	232
二、宋人筆下的南唐形象	239
第二節 南唐詩在宋初的影響	245
一、楊億對宋初詩壇的總結	245
二、徐鉉與宋初的白體詩風	247
三、鄭文寶及其對杜詩的整理和取法	252
四、宋初詩風受諸南唐的其它影響	260
結 語	271
主要參考文獻	275
附錄一 唐末及五代初期九華地區詩人群體考察	285
一、九華地區詩人群的形成	288
二、九華詩人群的詩歌創作	294
三、三種詩風的成因	305
四、與其它詩人的交往及對楊吳、南唐詩壇的影響	315
附錄二 隋唐曲《楊柳枝》源流再探索	321
一、中晚唐七絕體《楊柳枝》新聲	322
二、晚唐齊、雜言《楊柳枝》歌辭	327
三、南唐與宋代《楊柳枝》辭體式分析	331
後 記	341

緒論：研究對象及研究現狀

一

作為從唐音到宋調的過渡，五代十國的詩歌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關注，而五代十國詩壇中最重要和最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則是南唐詩。有學者根據《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等書統計，唐末五代作家的詩文集總數為 879 卷，其中北方地區為 234 卷，南方各地總數為 645 卷，幾占總數的四分之三，而吳和南唐詩文共計 297 卷，幾占南方詩文總數的一半，其中詩歌有兩千多首，比整個北方地區多出八百多首，在五代十國中為第一位。^{〔註 1〕}單從數量看，南唐詩已經不可忽視，從詩歌水準上看，南唐詩更是五代十國詩壇的翹楚。目前的研究雖然承認南唐詩超出於五代一般水準之上，值得關注，且注意到部分南唐詩人如徐鉉、李中等人無論在五代十國詩壇還是宋初都有一定的影響，但這些研究基本還只是將南唐詩作為五代詩歌的一部分來看待，沒有將南唐詩作為一個完整和獨立的對象進行歷時性的考察。同時，由於大多數研究者傾向於認為五代十國時期詩歌本身的成就並不很高，因此主要是將其視為從唐詩向宋詩轉型的一個中間形態來看待，連帶地也對南唐詩的獨立價值不夠重視。實際上，南唐詩乃至整

〔註 1〕統計數字據張興武《五代作家的人格與詩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版，頁 72～75。

個南唐文化的成就不僅有作獨立研究的價值和必要，而且從其在宋代的影響來看也不可忽視。

以宋代文化的地域結構而言，南方文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一特點在宋初已經顯現出來。《容齋四筆》卷五「饒州風俗」條記載宋仁宗時已經有人指出：「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讀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註2〕看到了唐宋之際南方文化崛起並佔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南唐腹地江西，在宋代文化中佔有突出地位，如果把這一變化僅僅歸功於宋朝是不公正的，實際上江南文化的迅速發展和超過北方主要得益於楊吳、南唐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和開發，宋代起初文化的發展其實是一定程度上的「南方化」或者稱「南唐化」。

不過，南唐文化在宋初文化中的地位很特殊：既受到壓抑，同時又被懷念和追慕。宋初文化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南唐：無論是從其三館藏書大部分來自南唐來說，還是從南唐入宋的文士成為宋初學術保存、以及詩歌創作的中堅來說都是如此。原南唐入宋的文人也一直保留著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如張洎出使中朝時將洛陽風景蔑稱為「一堆灰」，而徐鉉到北地卻不肯御皮毛衣服，以至於得冷疾而死。宋初的統治者卻往往對南唐文化表現出一種貶斥的態度：如宋太祖稱李煜為好一個翰林學士，太宗讓李煜去參觀三館藏書，並告訴他其中多是南唐舊物等，其中表現出來的意味就值得仔細琢磨。其實這是一種文化相對後進地區靠武力征服了文化較先進地區以後表現出來的複雜心態。不過，在顯現出貶斥和炫耀姿態的同時，宋朝也追慕和繼承著南唐的文化。這印證了精緻文化的吸引力終究是不可阻擋的，即使它不得不暫時屈服在武力之下。宋初文化中南唐影響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金陵圖籍入汴、大批原南唐文士被朝廷任用，也體現在宋人審美趣味上的逐漸走向於南唐化——注重博學，多藝能，講求精緻清雅的文

〔註2〕（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頁665～666。

人趣味等，這些也正是後來宋代文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宋代文人漸趨一致表現出的對南唐文化的傾慕，也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這種趣味上與南唐的相合甚至認同。

因此，要深入理解宋代文化的形成、尤其理解宋初文學的面貌，就需要追溯到南唐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這個起點甚至應該一直上推到中唐以後，當時北方文士大量南遷並進入南方的幕府，這促進了南方尤其是江淮一帶文化的發展，當然這也與當時南方經濟地位的增長、城市的發展分不開；唐末的戰亂再次使得許多文人退隱到南方相對僻靜和安定的地區，此時江淮一帶聚集起數個規模較大的詩人群體：宜春、九華地區和廬山都是如此，與此同時，以揚州為代表的城市中的文學卻因為戰亂幾近消失，因此宜春、廬山等地退隱之士的文學就成為楊吳文學最初的起點。當楊吳基本穩定了江淮、江西一帶，後來開創了南唐的李昇此時逐漸走上政治舞臺，包括他的聚集圖書、招延文士等措施，以及他本人對文藝的喜好，都對楊吳和南唐的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他對金陵城的建設和經營，使得東南地區的文學再次具有一個可以表現的舞臺，金陵詩壇開始發展，新詩風的因素開始出現。

儘管李昇號稱喜愛文藝，本人也有一些文藝才能，但他基本還是一種嚴正務實的政治家性格，他看重的文士也基本屬於謀略型、實幹型，如宋齊丘，而韓熙載、史虛白等具有縱橫之氣的文士並未得到其重用。李昇很可能是出於保據江淮這一立國策略的務實考慮，不贊同韓熙載等人立即北伐的主張；因此，韓熙載等人的浪漫縱橫家氣質最終被擯棄，而其長子李璟因耽於文藝也一直並非李昇心目中最理想的儲位繼承人。終李昇掌權時代，儘管其文治政策為後來南唐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文化措施主要限於招徠文士儒俊、設立學校、以及保存圖籍等，尚未有獨創的、建設性的文化成果。南唐文化獨特的精神儘管此時已經開始涵養，卻要到南唐中主李璟時代才真正形成。

中主李璟即位後，注重文才，從前李昇時代對經義法律之士的重

視不再被奉爲圭臬。韓熙載在李璟即位之初就得到重用，來到國都金陵，儘管李璟並未採納他北伐中原的政治主張，但李璟後來南征閩楚，至少表明他在對「天下一統」的浪漫想像上跟韓熙載如出一轍，其中不能說沒有後者的影響。其他如史虛白、喬匡舜、徐鉉等典型文士也在李璟時期或被召見、或者授官，以作詞著稱的馮延巳更一度成爲宰輔，更顯示了李璟由於個性中極富文藝氣質，因而更容易欣賞這些博學而多藝能的文士。李璟對人材的選擇與李昇有很大差異，以文雅而不是以務實爲先。雖然這一點間接導致了南唐的國基不穩，卻也直接帶來了南唐文藝的繁榮。

李璟在位時期，由於重用文士，後期又開科舉，南唐的文治顯露出相當的成效。好文的風氣所及，甚至武將也好作詩，如刁彥能；而北方的武人一直相當跋扈，好文的風氣不能得到很好的發展，如後唐秦王從榮之禍便起於從榮的好與文士詩文唱和、不禮重武人，而從北方投奔到南唐的武將卻都收斂起跋扈之氣，這也說明南唐文治的成效。李璟時代，與北方相比，江南文化的優越已經十分明顯：保大末年，後周派使者到南唐窺覷，假借的名義就是鈔書；李璟本人對江南文化也十分自負，甚至於認爲自古江南文士就多於北方。這無不說明南唐對自己的文化富有自信，而這種文化優越感並非沒有實力的根基。

此時南唐的文化可以說有一種南朝化的趨勢，即使李璟表現出的對功業——主要體現爲對大領土的嚮往，表面看來是因爲以唐朝後裔自居、以中興自任，實際卻是對東晉那種名教自然合一人格模式的追慕。《釣磯立談》記載：「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爲討閩之役，馮延巳因侍宴爲慢言曰：先帝齷齪無大略，每日戢兵自喜。邊壘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齎咨動色，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爲，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於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頷其語。」〔註3〕尤其典型地體現了李璟、馮

〔註3〕（宋）史□《釣磯立談》，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四），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頁。

延巳等人對以謝安爲代表、兼具事功和風流的人格審美模式的傾慕。在外表風度上李璟也體現出南朝遺風：「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姿致。湖南嘗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官家，其爲人粹若琢玉，南嶽真君恐未如也。』」（註4）此外，在物質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南唐都漸漸發展出一種清雅精緻的趣味，這種趣味也體現在南唐的詩歌中，如辭采溫麗，很少中朝、西蜀、楚地詩歌中常見的淺俗、諧謔風氣等。

中主時代南唐內部的黨爭和對閩楚的戰爭也在一些詩歌中有表現，這部分地改變了李昇時代的詩人主要限於表現一己窮通的狹小氣局。同時，以金陵朝廷文士爲中心的詩壇也對廬山詩人群產生了影響，使其對賈島詩風的追慕漸漸淡化，苦寒詩風不再是主流；金陵成爲南唐詩壇的重心。

李璟在位其間先是由於攻伐閩楚元氣大傷，後來又在與後周的戰事中節節敗退，終至盡失江北之地，國勢日蹙，南唐都城甚至一度遷到南昌以避北地之鋒。終李璟一生，他對南唐國力的衰弱都無能爲力，這種頹勢在後主李煜時期自然更加不可遏制。史稱後主李煜「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藏空竭」，不過由於其「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註5）儘管處於這樣蹙迫的境地，南唐的文化卻在這十五年間因爲境內暫時的安定仍然繼續發展。後主前期，曾力求致治，因而留心儒家文化，並曾著有《雜說》百篇，親自闡述爲政之要，但他在位的後期南唐文化潮流主要是朝著南朝化的傾向繼續發展。李煜本人一方面醉心於生活的精緻化、藝術化、審美化，一方面又試圖從佛教尋求解脫，這在他的詩詞創作中也多有體現。我們看到，李煜的這些表現顯然並非個例，而是南唐士風的集中體現。

〔註4〕《釣磯立談》，《全宋筆記》第一編（四），第228頁。

〔註5〕（宋）陸游《南唐書》卷3，《四部叢刊》本。

到中主末年，淮南、江西等地先後在楊吳、南唐的統治下已有半個多世紀，南唐文化已走向成熟，這種成熟又帶來了對自身文化加以總結的要求，因此出現了不少鴻篇巨製。其中尤著者，如朱遵度所撰類書《群書麗藻》、《鴻漸學記》竟各達一千卷之多；徐鉉則編有《賦苑》二百卷，又撰有《古今國典》、《方輿記》、《歲時廣記》等大型專書或類書，還有《說文解字韻譜》、《說文解字繫傳》等數種小學類著作。這些文化學術成果對南唐文學尤其是南唐詩歌究竟有怎樣的影響，還需要深入研究。單就狹義的詩而言，徐鉉、徐鉉都發表過自己對詩歌的看法，張洎也追溯了從張籍到唐末詩歌發展的線索。可以說，至此南唐詩人對自身詩學傳統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和表述，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和加以研究。

後主李煜在位末年，南唐在與宋的戰爭中處於明顯劣勢，並最終不可避免地徹底失敗，這一過程中當時文士的心態和立場也發生了分化：一部分憂憤國是，甚至為此付出生命代價，如徐鉉、潘祐；一部分因無能為力而選擇安於隨波逐流，並且，一些身為高級官僚的文士最終隨後主一同出降，徐鉉、張洎、張洎等人便是如此。他們或許不甘屈服，卻又不得不屈服，但他們的屈服並非沒有成果——南唐文化便主要憑藉著他們而進入宋朝，在宋代一直影響不絕。

二

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南唐詩是放在五代十國詩壇的整體背景下、被作為五代十國詩最重要的部分來研究的，這始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鄭振鐸在《五代文學》〔註6〕、《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註7〕中論及五代十國詩壇，認為與詞相比，詩的創作在這一階段十分衰落，作者雖多，卻沒有產生偉大的詩人，但晚唐諸派競鳴的盛況此時仍舊繼續了下來。

〔註6〕 鄭振鐸《五代文學》，《小說月報》第20卷第5號，1929年4月。

〔註7〕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楊蔭深《五代文學》〔註8〕則首次較為系統地探討了五代詩歌。該書分國別臚述五代十國文學，認為五代文學衰落，十國文學則不乏燦爛，但這燦爛只是在詞，詩壇雖然仍比較活躍，但詩格不高，已經不能與詞爭雄強。對於吳和南唐文學，主要採取列舉重要詩人的方式。吳國列出的詩人主要有殷文圭、沈顏二人。對南唐文學，除了標舉元宗父子及馮延巳的詞作以外，指出南唐詞人很少，仍以作詩的為多，較著名的詩人有韓熙載、李建勳、沈彬、孫鮐、廖凝、陳陶、陳貺、劉洞、江為、伍喬、左偃、李中、孟賓于、成彥雄、徐鉉等人。對具體詩人詩作的評價多簡潔概略，如認為韓熙載「其詩描寫直率、無蘊藉之處」、沈彬詩「多悲憤慷慨之詞」、廖凝詩「雋永耐味」。〔註9〕該書主要延續的還是以往詩話及史料中對各個五代作家的評價，不過，作者對五代文學也有不少新見，比如在南唐詞之外，也對南唐詩壇很重視。但就五代文學的研究來說，此書畢竟還處於草創階段，對各國文學的論列都還比較粗淺，對具體作家的論述筆墨就更少，還談不上對詩風、流派的辨析，因此，儘管南唐文學在書中所佔相對比重不少，但深入的研究可以說尚未開始。

在沉寂了五十多年以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涉及到南唐文學的論文和專著則逐漸增多。首先，就五代十國詩壇總體研究而言，重要的論文如：賀中復以《五代十國的溫李、賈姚詩風》、《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五代十國詩壇概說》三篇文章較完整地勾勒了五代十國詩壇的主要面貌以及前後期詩風的演變，〔註10〕其主要觀點是五代分別存在著學溫庭筠李商隱、學賈島姚合與學白居易的三種詩風，其中，學溫李者重在學溫，並走向清麗、通淺詩風；學賈姚者由賈島走

〔註8〕楊蔭深《五代文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註9〕楊蔭深《五代文學》，頁37、39、41。

〔註10〕賀中復《五代十國的溫李、賈姚詩風》，《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賀中復《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賀中復《五代十國詩壇概說》，《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

向姚合，三種詩風中以宗白之風勢力最大，學溫李與學賈姚者最後都向其趨近。其中，《五代十國詩壇概說》一文側重在對五代十國詩壇的整體研究，認為五代十國詩壇的特點之一是詩歌創作的群眾性、普遍性，這導致了它的「俗」的特點；各種不同規模、不同組合方式的詩人群體也紛紛出現，使整個五代十國詩壇形成多中心狀態。在這個總體背景之下，該文進一步探討了吳國和南唐詩壇，指出吳國詩壇形成較早，以杜荀鶴、鄭谷為中心，其主體是迫於唐末喪亂退居鄉里的吳地人，大多遵循先學姚、賈轉為宗白的道路，以至於這兩種詩風的融合，總體而言，復古傾向較重，另外，樂府創作較盛。南唐詩壇並非吳國詩壇的自然延續，而是由於南唐興復儒學、重用儒士等一系列措施之後在文化界的必然產物，形成了李建勳、馮延巳、徐鉉等為首的一批政界詩人群。之後，攻滅閩、楚的戰爭使得南唐詩壇勢力範圍有所擴大，孟賓于、廖凝等人加入其中。政界詩人群之外，南唐還以廬山國學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隱逸詩人群，包括陳貺、江為、夏寶松等人，李中則是隱逸詩人群與政界詩人群的中介。南唐詩壇主師古、祖風騷，雖也有學姚、賈一派，但主要是宗白並進而學習「元和體」，集中吟詠情性、表現憂患意識和吏隱情懷。具體創作中以俗為雅、緣情入妙、多理趣而少直斥，風格雅淡。

《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一文則集中探討了五代十國普遍流行、超過學溫李和效賈姚者而成為當時主導傾向的宗白詩風，其中多有對南唐詩的論述。該文以後唐滅亡、南唐開國為界，將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分為兩期：前期承唐而後期啟宋，前期宗白詩人倡導學習白居易詩的諷諫精神以反對唐末以來的浮靡詩風，並集中抒發亂離時代有志無時、懷才不遇的痛苦，進一步演繹白居易的平易作風和比興傳統。在詩體的創新上，以吳國詩人的貢獻最大，嘗試融合古今、改造詩體，提高古體和近體的表現力。以南唐開國為限斷，後期宗白詩風發生了轉型，力圖糾正前期學溫庭筠詩導致的輕豔以及學賈島導致的僻澀等問題；南唐重文右儒的政治舉措使得南唐形成了一個以上層重

臣爲核心的龐大宗白詩人群，其創作追求較之前期更多新變：（1）由主學白居易詩進而發展爲師法整個「元和體」，尤其是元和古風，以求變革唐末以來風雅道喪的狀況；（2）由前期宗白的學習其諷諭詩轉爲集中學習其閒適、感傷、雜律詩，但在閒適詩中也交織著對政事的關心；（3）由前期的宗白兼學杜甫轉變爲宗白而兼學李白。在這些新變的基礎上，後期宗白詩風形成了幾個重要特點：吟詠情性，集中揭示上層官僚的生活情趣；次韻唱酬之風流行，但仍以抒懷爲主；率意而成，不刻意苦吟，近體暢達、古體也流易自然，寓說理於描繪；清淡典雅，以俗爲雅、雅俗融合，思深理精。

賀中復的這三篇論文較細緻地勾勒了五代十國詩壇的主要面貌以及前後期詩風的演變線索，將吳國和南唐詩壇的概況和流變也梳理得比較清楚，尤其是用政界詩人群和廬山詩人群兩個詩人群體來劃分南唐詩壇，顯得結構明晰。在具體結論上，如認爲南唐並非對吳詩壇的自然承續、南唐宗白詩風的前後變化等方面，也很有啓發意義。

劉寧的《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註11〕一書關注的重點在於唐宋詩歌的轉型過程及其成因，而以元白的「元和體」的影響爲中心線索，在精神意趣以及藝術上貫串了從唐末到宋初詩歌轉型過程的始終。就時段劃分而言，該書將五代與唐末劃爲唐宋詩轉型中的同一個大的階段；按照不同地域特點，五代十國詩人被分成中朝、南唐、西蜀、楚國、閩地和吳越六個群體。具體到吳和南唐詩人群，該書首先指出就士人身份而言，與進入蜀國和閩國的多爲中朝顯貴相比，在唐末亂離中，進入吳國的士人則多爲寒素出身，因此在詩歌風氣上較多地繼承了唐末寒素、隱逸及干謁詩人群的創作取向，詩人成分複雜、詩風也十分多樣。南唐詩歌藝術的繁榮又與它的詩人群體的構成方式有密切關係，它有一個龐大的朝士詩人群，同時還存在一個在野詩人群，廬山國學則成爲二者間的紐帶，並使得二者之間的詩風走向融

〔註11〕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以元白之元和體的創作影響爲中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